

现代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日中关系 ——
对日抗战的序曲·1927—1937》评介

周启乾

在近现代中日关系史领域中,对于近代中国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以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都有较深入的研究,而对于20世纪20至30年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日本钏路公立大学教授 原充博士的近著《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日中关系 ——对日抗战的序曲·1927—1937年》(京都Minerva书房,2000年9月发行),则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著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之下,经历了20年以上的迅速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几次高潮之一。其他的几次是:20世纪初的10年间,在清朝“新政”之下振兴民族资本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不久,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以轻工业部门为中心而谋求取代进口的时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中日战争爆发的19年间,与其前后时期相比,是基本实现国家统一,保持相对稳定的统治形态的时期。这时,在基本实现了代替进口的轻工业的发展之后,开始着手于以国家为主导的重工业建设。

著者在该书着重考察的,即是自1927年南京政府开始统治(不含东北地区),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围绕中国钢铁工业与铁路建设以及华北地区的日中关系。全书共分为三大

部分,即一,围绕钢铁业的日中关系:南京政权时期的钢铁业、中央钢铁厂的建设计划、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二,围绕铁路建设的日中关系:南京政权时期的铁路建设、粤汉铁路全线贯通与日本、江西福建的铁路建设与日本;三,围绕华北的日中关系:围绕山东权益的日中关系、在冀察的合作事业的展开过程。在终章“通往日中开战之途”中,主要就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日中之间相互采取的对策、与欧美各国的关系和地方政权的动向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著者花费了 10 年以上的时间撰写该书,早在 1990 至 1991 年和 1995 年,即曾先后前来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研修访学,作过较长期的逗留。其间不仅遍历有关的图书馆、档案馆,而且还广泛接触有关的专家学者,乃至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或其亲属,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日本国内,著者也遍访各主要史料收藏机构,致力于原始资料的搜集。该书正是在大量运用中日双方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严谨的实证研究。

著者认为,在 1927 至 1937 年的 10 年间,日中之间发生了从出兵山东直至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的一系列军事冲突,构成了日中战争的前史。这些事件的起因是个重要问题,只从经济方面分析远远不够,而必须从日本的政治军事制度、思想潮流乃至国际环境等多个层面予以剖析。然而,当时的日本舆论却是片面强调日本从清末以来所得权益受到“侵害”,而并未深入考察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许多日本人依然把中国当成了实施恫吓外交以强行获取权益的对象。著者指出,日本否定南京政府的“统一与建设”,企图继续坚持过去的权益,究竟孰是孰非,乃是显而易见的,而为了查明导致战争的原因,对于日本在华权益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便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著者还指出,如果把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视为“侵害(日本)权益”的重要原因,

日本便以军事行动加以对抗,结果则是日中战争不仅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还在长期冷战的条件下使中国经济成为战时经济,这正是日本的“战争责任”。著者强调,在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两次挑起战争之时,都正值中国经济最为兴旺之际,不能不痛感责任的严重。笔者认为,这都是该书著者很好的见解。

该书指出了日本方面以往研究在华权益的局限与不足,例如,主要依据于日本史料,关注其拟议过程、政财界的动向、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关联等,而对于中国方面采取的对应措施及其对于中国的意义等,却未予重视。由于这些权益多在 20 年代以前取得,所以研究也多限定于这一时期,对于其后的发展变化并未作进一步的探究。此外,在对于殖民地的研究中,是将重点置于被称为“满洲”的东北三省。至于关内,则大体又是作为日中战争爆发以后的占领地区,才将其列为研究对象。因此,包括对于与中国对抗关系的分析,除了部分外交史的研究以外,从整体上看,对于 30 年代日中关系的研究尚嫌不足。

著者还指出,在战前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中,常常是过于强调中国社会的停滞性,而否定其内在的发展契机,这便导致“发展外因论”,成为把侵略中国合理化的根据。另一方面,在战后长期以来直至 70 年代,中国方面在强调当时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同时,还强调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腐朽性和买办性。例如认为该政权的币制改革不过是“对人民的掠夺”,资源委员会推进的重工业建设,也被当成为了“镇压革命人民”而采取的军事上的对策。通过把南京政府描述为不断对日妥协的卖国政权,贬低其在抗日运动中的作用。而战后日本同样受到了这种史观的影响,对南京国民政府缺乏客观的分析。著者认为,迨至 80 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从“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对于当时政治、经济的研究趋于活跃,并尝试对南京国民政府作出积极评价。

在该书中,著者致力于以下几个问题的分析:一、南京政权时期的经济建设具有怎样的目的;二、这种政策在实际上带来了什么样的成果;三、这种政策的结果使日本在中国拥有的各项权益蒙受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使当时的日中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著者在考察中国的钢铁工业时指出,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并以战后 20 年代初期为其发展的顶点。此后产量下降,至 30 年代,生铁产量(除土法生产外)仅为 2 万吨左右,而此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生铁产量则迅速提高,日本国内的产量更已超过 200 万吨,使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也导致了研究的显著滞后,无论战前或战后,日本研究者中的主流看法,都是认为中国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还依然停留在零星的手工工场阶段,而强调其“显著不发达”的一面。同样,中国也在长期间内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作为钢铁业不发展的根据,而没有注意到它发展的契机。该书则较细致地考察了南京政府的重工业政策的建设中央钢铁厂的计划,其中包括其地点的选择、原料的供给、所需资金的筹措、设备的提供、计划的变动与具体化,指出了从最初的以振兴实业为目的,进而转向侧重国防建设和为抗日战争作准备的具体过程。著者以大量史料把过去长期被当作“机密”的建厂计划公诸于众,从而说明以往那种先入为主地把它斥为“(提供借款的)法西斯德国与中国大买办的杰作”,乃是过于简单化了。

汉冶萍公司曾是日本在华中获取的最大权益,日本通过基于大笔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得以大大低于市场价的低廉价格长期稳定地确保大冶铁矿石的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购入的铁矿石中,大冶矿石所占比重高达 6 成。此后由于南京政府不断加强对铁矿石出口的统制,比重即陆续下降,至 30 年代中叶降至 1 成,使日本不得不转而谋求于其他

国家和地区。

根据估算,在 1927 至 1936 年间,中国的纺织、机械等 15 种近代工业产量(除东北)的年平均增长率约达 7%,这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的条件下,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数字了。著者认为原因即在于南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景气的产业政策发挥了作用,以及政府自行创建重化学工业。

该书认为,南京政府在经济建设中最重视钢铁业与铁路建设,这两者又是相互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产业部门,所以作为考察的重点。著者指出,南京政府通过铁路建设推进中国国内的统一与经济发展,新线建设集中于华中与华南,有助于日后抗战据点的形成和确保战时的对外联络通道。因此,中国一贯努力排除日本的参与,日本也以其带有“政治色彩”而加以反对。当时正值世界经济总危机的恢复过程中,欧美国家把统一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市场,对华投资活跃,借款条件也相对宽松。英国为在欧洲对抗德国的威胁,在远东采取对日绥靖政策,虽希望拉日本共同参与对华投资,但日本均采消极态度。中国方面对日警惕,当然也不希望其参与。中国的铁路建设促进欧美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使日本原来拥有的在华铁路权益日趋衰退。在中国经济建设的舞台上,日本被孤立于其他列强之外。

该书还分析了日本在华北推行“经济提携”政策以掠取资源,指出其选择向华北扩张势力的据点时曾有两种考虑,即所谓“天津中心论”和“青岛中心论”。但作为日本的国策,正如中国驻屯军参谋池田纯久所分析,“对华北的工作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历史上看,虽当然应从山东着手,但是,冀东、冀察乃与满洲国相邻之地,所以应将这里掌握之后再倾注全力于山东”(原书 257 页),加紧了从政治上阴谋分离华北的活动。作为典型事例,著者通过日本对独资建设津石铁路的筹划,说明无论关东军或外务省都企图排除

欧美与南京政府的介入,以确立排他性的地位。

著者同时认为,日中战争虽然发端于华北,但以往的研究对中国方面的动向不够重视,未能明确描绘出中日两国在华北的对抗关系。冀察政权作为日本与南京政府之间的缓冲政权,对日本有“从属”与“抵抗”两个侧面,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从属”的一面,而忽视其对抗关系。南京政府一方面以华中、华南为重点推进经济建设,并且不让日本参与其计划,在华北则尽量避免同日本对立,并摸索与日本协调关系。当然,其主要着眼点在于前者。不过,日本从华北大肆掠取原料,对于华北政权来说,这种单方面向日本提供原料的“经济提携”,不仅毫无利益可言,而且对于当地民族资本更是严重威胁,促使冀察政权向南京倾斜,转向拥护中央政府的立场。于是,日本便又进一步加紧其分离活动。著者引用日本外务省记录中,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于1935年12月致外相的电报所说,目前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期,即日本的对华政策应该从“以往一般性地维护与增进我方利益的普通外交政策,进一步努力以改善中国的政治行政作为根本”(244页),谋求巩固华北“自治政权”的基础。

关于南京政府,著者认为它一方面在权威主义体制下压制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采取了反帝国主义的政策,自上而下地迅速推进工业化。与此同时,为了制止华北的“特殊化”,它也加强了对那里的统治,这不仅限于政治上,而且还通过铁路运输增大了与华中经济圈之间的物流,逐步使其融为一体。随着时间的发展,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又增强了发展国防建设的一面。作为转折点的1932和1936年,其出现的背景正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5年11月冀东伪政权成立后两国关系恶化之际。1932年以后,建设的地点便避开华北而集中于华中、华南,迨至1936年以后,则更进一步迁入内陆地区,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都是由于设想到了日

本的侵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一八事变即使不是两国之间战争的起点,但也由此而决定了经济建设方向的新的改变。

通观全书,著者对于日中战争前 10 年间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与日中关系的若干重要侧面,作了深入的探讨,很有参考价值。著者还表示,希望通过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找出导致日中战争的原因,并认为,导致日中战争的经济原因,不仅要从日本方面,而且也要从中国方面来查明。于是,当时中国政府与人民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而导致日本原有在华权益受到所谓“侵害”等,似乎便也成了著者所要寻找的原因。对此,笔者愿意强调,在考察导致中日战争即日本侵华战争的原因时,一定要分清主次,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看,导致中日战争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与掠夺的一贯政策。

(作者周启乾, 1939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兵)